

故事中的“我”与“故事”

——读《自我的他性：当代中国的自我系谱》

王琳¹ 仁青翁姆²

1. 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2. 四川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摘要】在田野调查中对民族志故事的描述和思考是民族志发展过程中的重点。刘新的《自我的他性：当代中国的自我系谱》一书是实验民族志的作品。在民族志描述过程中以第一视角进入，将“我”作为故事中的一部分，“故事”的叙述也带入更多的客位视角成为描述的焦点，与经典民族志中需要呈现的真实进行了重新思考。作者将快速发展和转型中的中国人的状态特点归纳为“自我的他性”，对人物的描写和分析更趋向于多维度立体式的方式，从更为个体化的角度进行相关的理论对话，对于个体的关注和在社会的分类作用的方式，也成为反思民族志作品对社会和历史认识的作用。

【关键词】民族志；故事；自我的他性

【DOI】 10.12252/j.issn.2096-6261.2021.11.427

《自我的他性：当代中国的自我系谱》此书出版于2005，作者主要讲述的是2000年初华南某一沿海城市的商业实践逻辑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三类人（官员、商人和小姐）作民族志描述，阐释他们所讲述的有关自我或他人的故事，从而揭示当代中国的自我结构。

本书的特色在于进行以城市空间为分析对象的田野工作，或明或暗地对以村庄为分析对象的人类学研究的经典模式提出批判，民族志描述的焦点不再是人们的实际经验，而是他们讲述的故事。当代中国正在经历一场剧烈的变革，在变革中，中国人的性格发生极大的变化，他们随时改变自己，甚至很容易就能在性格上变为另一个人，这就是作者所说的自我的他性。作者本身的身份也是他者一与自我的一种阐释和视角。本书是一种民族志理解而不是民族志观察，在跳出乡村视野，对于现代城市生活的人类学研究。作者在书中理论对话主要有福柯所讲的，现在历史是解构而后建构的行动，是将理论和故事的原有要素投射到当下的智识背景中；雷蒙德·威廉斯的情感结构的历史考察；维特根斯坦所称的“家族相似性”个体呈现作为一种事例；引入格尔兹把社会的领域界定为意义的领域，文化与意义的公共性。

作者借助自我系谱这一术语，在自我呈现的联结结构（延用布罗代尔的概念）内部发生的错位。自我呈现，可以被宽泛的理解为追问“何为善好生活”？构成了我们存在的可能性所依生的道德空间，同时又被这个空间建构着。自我谱系由几个结构整体统一而成，而本书想要做的就是捕捉这些要素与力量在当代中国的结合。中国道德的改变、时间观念、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的话语空间的构型（因为影响着自我和他人的讲述方式）中国的资本主义精神，揭示复杂的投资结构来自社会和政治资本的影响。

一、故事的开始

作者以极为写实的方式从尼桑车里的故事作为开头，观察了公司的高管在与政府官员之间的故事，电话、办公室以及KTV，三种不同场合中两位处长对于签订合同的情绪变化。中国官员通常的行事方式是弃简从繁，也就是其行事的依据

不是事情本身的特性，而是其个人选择、意愿、喜好。这无益于行政管理效率的提高，只是扩增了官员在经济、文化、社会与政治领域的资本含量。以下各章将论述官方资本的各种意义，这种不同于布迪厄所称的社会资本。官方资本与社会资本的差别在于，官方世界的范围较于社会时大时小：它既是社会的一部分，又掌握着使社会合法化的权利。它和象征资本也存在明显的不同，官方资本含有实际的经济价值，这方面的投资是赢得商业的前提。“理解那或实或虚的剧情，构成把握当前中国商业实践逻辑的关键”。

民族志写作的手法一方面是人们的言行，另一方面是人们如何谈论其所作所为。人们的言辞被归为行动的一部分，这和人们对自身行为的评说是截然不同的，因为后者涉及到人们对自身行为或互动的推理，赋予以意义连贯的说明，并提供各种理由。实际上存在两种人类学的研究方式，1集中描写人们的行为，2分析人们对自身实践的述说。其实在民族志写作过程中是将二者糅和在一起，也就是田野工作过程中的观察和理解。再一次从研究方法上强调了本研究不仅是将b市的故事描写出来，故事或评说的讲述形式是本书分析的焦点。

理论假设：1 各类日常场合下讲述的故事，是由具有历史与文化特性的叙事结构所建构的人物，情节单元以及场所组成的。在各式故事的讲述中，这三个元素必不可少，它们的真实性不是得自于时空情境，而在于为预想中的现实成为现实提供了可能的条件，这也是本书的中心论点所在。2. 如戴维·卡尔等人所述，实际经验本身由叙事结构视为社会存在的历史形式，为理解存在方式本身提供了路径。

二、故事中的人物

人物是本书的核心范畴。对于“人物”概念的梳理麦金太尔指出的：特定的人物与一般意义上的社会角色不可混淆。这种非常特殊的社会角色，以其他角色所不具有的方式，对其扮演者的人格施以道德约束。社会角色不属于人物，因为他们缺少人物个性所必须的道德特质。在中国怎么区分，又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呢？在中国是两种经验的历史形

式，而不是两种文化，革命时期和后来经济发展时期。作者将人物分析作为解读社会与历史的人类学模式。人物是某文化中全体成员或部分重要成员所尊奉的对象，赋之以文化与道德的理想，因此，这需要角色与人格的融合，即社会类型与心理类型的吻合，人物为社会存在的样式提供了道德上的合法性。人物是有关我们自己或他人的故事得以讲述所必须的参考点，此即本书探讨人物概念的根本意义，其中隐含的假设是，当前，全球化淤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引发了人们生存模式的转变，面对这样的当代生活条件，民族志的写作离不开对人物及其关系的分析。

商人、官员、小姐三类人物之间的关系以及各种角色的在不同人眼中的功能作用都有所不同，包括他们自己本身对自己的认同也是一种角色的演绎。以人物而不是社会角色的进行分析，能更好的理解不同领域。三种人物互为关联，构成一个功能整体，三种人物而非各自的身份，对建构这样的整体不可或缺，并且决定了b市故事的叙事结构。

处长作为一种代表官方世界形象的人物具有什么样的特性，代表着对国家权力的日常想象因为是一种日常生活中国家形象。处长这一职务具有的决策权是个人地位的重要标志。官员之间的等级差别，以及官员内心想要获得更多的权力和更高的位置的心愿在日常交往中都有表现。不仅是吃饭，而且还包含性服务，在中国的日常商业世界两方面被性化，其一，人们可以借助性方面的比喻，来谈论特别是与官员有关的一切社会、政治或经济行为，其二，各种娱乐场所的小姐成为商业运作的前提条件。老板具有公司的所有权，也就是负责出钱的人。学位成为一种社会资本，可以快速进入到关系世界。现实的世界，钱比文化更为重要，催生了老板的产生。小姐这种人物在商业实践中的功能，其并非仅仅发挥辅助性的作用，而是商业实践本身的内在组成部分。小姐作为商业实践的工具是一种物化的表现。

三、故事叙述的结构模型

故事中老板办公室作为一种场景或是背景，象征着权力和财富。一切都是权力的象征。通过对宴请的叙述中体现的社会关系与政治关系，食物与餐桌文化构成了社会化的关键部分，不仅生存相互连接人们的关系，还为这种关系设置了意义。餐桌上权力不同于福柯所提出的社会与历史存在本质的权力，而是意味着横扫一切的力量和当下的动力结构。宴请是商业生活实践中的必要部分，这标志着所谓娱乐黄金生产线的起始。主客双方共存于这种罕见和高贵为特征的权力关系之中。夜总会也要讲排场和等级，不同的等级所展现的权力不一样，但是在一切都安排好之后，商官之间似乎就是平等的了。在人类学家眼里是一场构造社会关系的一场革命。小姐在工作场域中赚到了钱，在家庭环境中似乎又被得到的了认可，但她们自己知道一切都是以钱为准的。

文本是的世界是符号及其意义所生长的地带，其地貌

特征受到深层意义结构的扰动。戴维·卡尔讨论胡塞尔的内部时间意识指出，叙事所涉及的不再是现实的表述，而是现实的本质。对空间比喻的运用是讨论内部时间意识的关键所在，卡尔指出，人们所体验的时间是一种结构化和已然形成的时间：我们的经验直接朝向采取扩散的时间形式，其中未来、现在和过去交互作用并合为一体，人类经验的本质是叙事性的，结构是指现象学传统中意向性结构，也就是鲜活的经验结构。

作者在这样的立场对b市进行民族志叙事分析，人类经验的本质以叙事形式结构化。目前有关中国社会变迁的人类学研究，是把叙事仅仅当作一种国家力量从外部强加给社会的表述形式，但是作者认为，叙事对经验的成形至为关键，叙事是我们得以成我们的方式。鲜活的经验真正获得了生命，因为广义的自我是伦理道德的空间构型，它实则引发我们思考我们的存在。之所以从这样的理论视角提出有关“我们”的问题，是因为我们所遇的历史或社会状况，是以伦理道德构型整体的“我们自己”作为先决条件，对于“我们”的追问，也是探寻我们存在于历史或社会之中的可能条件。

四、叙事的整体与嵌入

对从事叙事研究的文化理论家而言，若想了解文化差异，就需要考察不同的故事讲述方式，布洛克指出，认为图示组织了社会群体的经验。日常经验多姿多彩，不可划归为个别的叙事模式因为人们会依据情景的不同来改变故事的内容与讲述方式。我们的自身存在，嵌入在时间结构之中，时间是叙事的本质，通过引入时间分析，作者将检视在当地中国社会，日常经验的组织形式是如何发生转换的。考察将有关我与他人的故事组织起来的时间概念，有助于理解经历巨变的社会内部，人们面临着怎样的生存条件。

形式研究-形态学分析是把故事设想为一个整体，研究其结构特征，而历史研究探询的是民间故事的起源与经年累月所发生的变换。形态学分析指出，依据故事各个组成部分及其相互之间、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关系来进行描述。民族志书写的日常生活应该具有两面性，具体情境下的千姿百态，故事的重复性将经验组合为文化形式的过程又具有同一性。

最后，本书具有三个层次，首先是民族志描述，刻画了B市商业实践的鲜活世界，其次，从我们这一位置来讲述B市的故事，以理解此世界特有的景象及其未来的可能轨道，最后一个层次扎根于当代知识界在社会重构方面所作的努力，提示勿将主体位置当作实体或实质，这也是作者为什么把书写对象称为人物的原因所在。

参考文献

[1]康敏.民族志与"我"和"我的叙述"--以刘新《自我的他性：当代中国的自我的谱系》为例[J].思想战线，2005，31（1）：88-91.